

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张季风

内容提要: 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如果除去战乱时期,战前日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很有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初由农村进入城市,其中一部分进入中小企业乃至城市的近代化大企业,而绝大多数则为饮食、服务业等“杂业层”所吸收。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虽然没有战后快,但其特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逐渐转移,这既保障了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又维持了劳动市场的均衡,其转移过程也比较稳定。这种稳定有序的转移以及依靠城市化解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值得借鉴。

关键词: 日本 农村 剩余劳动力 转移 特点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人多地少是两国的共同特征。战前的日本和建国以来的中国相比,不但产业结构十分相似,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剩余率(农村剩余劳动力数/农村劳动力总数)也极为相近。在某种意义上讲,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与战后相比,对我国更有借鉴意义。日本从明治初期到20世纪20年代,利用大约50年的时间将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80%降至50%左右,1946年曾接近40%。战后,由于大量海外撤回人员涌向农村,1942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又重新回升到53%(见表1),而从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为止,我国也将农业劳动力的

表1 战前日本就业结构、农家户数、城市化率变化状况(%)

	第一产业 (千人)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就业人口 (千人)	农家户数 (万户)	城市 化率
1871-1877	80.1 (17184)			100 (21477)	564	
1878-1882	82.2 (16059)	5.6	12.1	100 (19537)	550	
1888-1892	76.1 (17176)	8.9	15.0	100 (22570)	545	10.0
1898-1902	71.0 (17580)	11.8	18.2	100 (24761)	549	11.9
1908-1912	63.1 (16511)	14.8	22.2	100 (26166)	552	14.5
1918-1922	54.9 (14904)	17.1	23.0	100 (27147)	555	18.0
1928-1932	50.5 (14778)	16.8	32.6	100 (29263)	561	24.0
1938-1942	43.5 (14720)	26.2	30.3	100 (33839)	550	37.7
1944	43.7 (14790)	27.0	28.7	100 (32480)	570	38.0
1946	53.3 (16990)	22.3	24.4	100 (31877)		28.0

资料来源: (1)就业人口资料, 1877年以前是根据中村隆英著《战前日本经济成长的分析》附表第3表计算的, 1877年以后根据山田雄三编《日本国民所得推测统计资料》第218页制成。(2)农户数是根据大川一司等著《长期经济统计(劳动力)》及《农林统计》各年版制成。(3)城市化率是根据黑田俊夫执笔及总务厅统计局监修《1985年国势调查专论系列之五城市化结构及其变动》(1990年)第12页制成。

比例从80%降至50%左右,所用时间大约也是50年。^①

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上看,战前日本虽不比当今中国显著,但也相当严重。南亮进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经济的转换点大约在以1960年为中心的数年间”。^②所谓转换点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由“无限供给阶段”转变为“有限供给”的时点。换言之,直到1960年前后日本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个国家究竟存在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西方经济学中可利用生产函数加以计算,但是,这种计算本身相当烦琐,而且影响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原因(诸如生产力水平、农业收入水平、粮食自给水平和兼业程度等)也非常

复杂,剩余的形态各异,实际上进行精密的计算几乎不可能。尽管如此,如果抛开上述复杂的原因,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为基础,利用农民人均耕地负担法也可大致算出剩余量和剩余率。例如,战前日本总耕地面积约为500万公顷,若按农民人均负担0.4—0.5公顷为基准进行计算,^③有1000—1250万劳动力即可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然而,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总数基本保持在1500万人左右,亦即战前日本农村通常有250—500万人的剩余。这一数字与伊藤达也教授的研究结果,即战前日本“农村潜在外出者(剩余劳动力)”常年保持在400万人左右的结论相吻合。^④据此也可推算出战前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在20%—30%之间,这与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力30%左右的剩余率相当接近。

在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我们定会有所启迪。

一、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轨迹

日本早在1881年就制定了《户籍法》,1872年建立了户籍制度,开始了关于人口出生、死亡和流动等指标的动态统计,此后又于1920年开始进行国势调查(综合国情调查),这些丰富的统计资料为我们研究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综合战前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笔者认为将明治初期至1945年的70余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划分为准备阶段(1868—1887年)、正常转移阶段(1888—1930年)和动荡阶段(1931—1946年)三个阶段较为妥当。

(一)准备阶段(1868—1887年)

明治初期,日本是一个农业劳动力占绝大多数的典型农业国。明治新政府引进欧美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了“殖产兴业”的现代化大政方针。作为现代化方针政策出发点,首先废除了限制职业选择、流动和居住等自由的各项封建制度。而且,还废除了“士农工商”的封建身份等级制度。上述一系列改革的实施使农村人口流动变为可能。此外,明治新政府将普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强制推行《学制令》。事实上这等于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人口普及教育。教育的普及为日本实现现代化,也为日本始终保持低人口增长率和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只是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做了必要的准备,实际上的转移成效甚微,或者说仍处于停滞状态。农业劳动力从1718万人微减至1700万人,就业比重从80%降为76%,20年时间只减少了4个百分点。其原因有:

第一,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对劳动力未产生更大的需求。这一时期是日本现代化的草创期,伴随着政治改革、战乱及内乱频繁,社会很不稳定,经济发展尚未进入轨道。明治初期,在“富国强兵”的方针下,政府重点在城市发展劳动力吸收能力很弱的官营军事工业,而劳动力吸收能力很强的民营工业在城市却很少见。虽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民营工业在农村有所发展,但主要吸收了一些兼业劳动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为了尽快建立现代化的军工产业,从欧美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机械设备。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固然加快了建设的步伐,但同时也带来了“机器排斥劳动的后果”。过早地走上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道路,必然会影响对劳动力的吸收。

第二,该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滞的原因也与日本的家庭制度密切相关。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农民负担加重。直到19

世纪 80 年代,农民负担的高额地税始终高达国家税收总额的 80% 以上。特别是 1881 年明治政府实施“松方紧缩财政”以后,农民生活愈加贫困,并开始迅速分化。据古岛敏雄教授的统计,1873 年府县平均出租耕地比率为 27.4%,而 1887 年上升到 39.5%。^⑤农民如此破落,按道理本应该大批离农、外出谋生,但日本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最多也不过是家庭个别成员的离村打工而已。其原因在于,日本社会从传统习惯上看,对“家”的延续极为重视。而“家”的延续又主要体现于农业生产的延续,家庭成员全部离农离村则意味着“家”的灭亡。因此,农民即使生活再贫穷,也不轻易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举家迁移。此外,当时非农产业工资低,只靠做工难以维系生计也是农户不能举家迁移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正常转移阶段(1888—1930年)

这一时期是近代日本的确立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始步入轨道。日本只用 30 年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各国用半个世纪才完成的产业革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若将 1888 年与 1930 年的各产业就业人口加以比较,我们可清楚地看出,1888 年劳动力总数为 2257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 1718 万人,占 76.1%,而 1930 年劳动力总数增加到 2926 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却减少到 1478 万人,所占比例降为 50.5%,40 年减少 26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也出现减少现象,与 19 世纪 80 年代相比减少了 13%。这说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但完全吸收了新增劳动力,而且还吸收了许多在业农业劳动力。

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毫无疑问是非农产业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近代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但近代工厂、矿山、铁道建设及其他土木建设工程对劳动力需求旺盛,而且,分

布于全国各地的以纺织工业为基础的小工业和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为非熟练工人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换言之,不仅近代大工业吸收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家庭经营的中小工厂、大小商店在盛衰枯荣的过程中也对剩余劳动力起到了吸收作用。

(三)动荡阶段(1931—1946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进入战时体制。出于战争的需要,其重化工业部门得以迅速发展,这一部门的就业人口也有所增加。但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吸收劳动力能力极强的轻工业被列为“不急不重要”的产业,其发展受到严重限制。轻工业、纺织工业的萎缩不仅从总体上抑制了就业的扩大,而且发生了昭和“经济危机”,使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员剧增。据本多龙雄教授的推测,“如果将未就业人员、提前退职人员、不完全就业人员的总数加起来,当时的失业规模约在200—300万人之间”。^⑥当时日本的非农产业就业1500万人,可见其失业率已高达13%—20%。由于经济危机,企业大批破产、就业萎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理所当然严重受阻。过剩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在农村同时爆发,酿成深刻的社会问题。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将国民的目光转向海外,企图通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和海外移民来解决问题。其中已付诸实施的“满洲移民”计划是最明显的例证。“满洲移民”做为侵华战争的重要一环,最初是以在乡军人为主的武装移民和试验性移民。1936年日本政府的《20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计划》公布后,开始转为大规模农民“开拓团”移民,先后共14次,其中,“开拓团”移民222590人,“少年义勇队”101514人,两者合计321873人。^⑦因为本国土地少、人口过剩,就去侵略别国,霸占别国土地,分给自己的农民,这纯属强盗行径。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满洲移民”计划给中日两国人民心里留下的伤痕至今犹存。战争期间,由于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非但未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加重了危机。战后初期,由于大批复员军人、海外回归人员、城市疏散人员返回农村,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剧增。如表 1 所示,1946 年底农村劳动力绝对数猛增到 1699 万人。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上升到 53.3%,倒退到 20 年代的水平。

二、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如表 1 所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出、转化为非农产业劳动力的过程。在劳动力总人口当中,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上升。但从总体来看,战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比较缓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封建制度下的超小农制度几乎未被触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虚弱经济体制下,不仅不断再产生农村过剩人口,而且也产生了大量的城市过剩人口。加之传统的家族观念的束缚,破落农民只能勉强维持其小规模经营,通过兼业来补充生计,长期沉积于农村。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尽管速度缓慢,但在其长期的转移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准备阶段,明治政府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各项改革,加之战乱,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并未进入轨道。而 1931 年以后的动荡阶段,因日本处于备战和战时状态,整个情况比较复杂,应进行专门研究。故本文对以上两个阶段的特点不做重点考察,而重点探讨正常转移阶段(1888—1930 年)的一些特点。

(一)稳定转移

战前日本农村社会与欧美各国及战后的日本相比具有非常

明显的特征。从明治初期到战后的70余年中,虽然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例由80%降到了50%,但其绝对数量却惊人的稳定,始终保持在150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与农户550万户和耕地面积500万公顷并称为战前日本农村的“三大不变数字”。

日本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东精一教授指出,明治以来农家户数几乎是一定的。无论经济景气与否,每年都从农村向非农产业定量流出40万左右农业劳动力。^⑧持相同见解的还有本多龙雄教授。他指出,明治初年的农家户数550万户,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同时农林业就业劳动力始终在1500万左右,无太大变化。这一事实说明相当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的剩余人口完全离农,其中大部分离开农村迁居城市。^⑨农业经济学者并木正吉先生依据1920—1955年期间每5年的农业人口流动统计资料,得出了更明确的结论,即战前日本每年流出农村人口40万人、劳动力30万人,自然增长部分被排出。^⑩人口即使增加,也只是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农村人口和农家户数密切相关,由于长子继承制度的存在和剩余劳动力的稳定流出,户均人口(除个别情况以外)基本上未出现大幅度变动。农家户数和户均人口的稳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战前日本农村农户只留下满足农业简单再生产所需的人口,而其他剩余人口被稳定地转移出去。

(二)转移者以次子、三子等新增劳动力为主

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英国不同,总体来看并非采取举家离村的形式,而是以家庭个别成员离村的形式进行转移的。^⑪无论经济景气与否,每年从农村流出30—40万劳动力,这些流出者主要是农户的次子、三子。野尻重雄教授于1937—1940年期间,对东北、北陆和关东地区的7县20村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次子、三子的离村率远高于长子,而回村率却明

显低于长子。如表 2 所示,转移者中次子、三子劳动力占绝对多数,约占 80% 左右。此外,从外出者的回村率来看,长子回村者达 15% 以上,而次子、三子回村者不足 5%。长子劳动力与次子、三子劳动力相比,前者几乎不离村,即使离村也有相当部分回村,而后的离村基本是完全离村非回归式的转移。在农业生产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条件下,农忙期和农闲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不相同。一般来说,次子、三子从学校毕业后的 2—3 年间,在家里帮助父兄从事农业劳动,以报养育之恩,然后外出求职谋生。

表 2 1920—1930 年期间日本农村劳动力离村与回村状况

(单位:人、%)

		a	b	c	d
		离村人数	离村率 $\frac{AorB}{A+B}$	回村人数	回村率 $\frac{c}{a+c}$
长子 A	上层	88	11.4	26	22.8
	中层	170	20.1	30	15.0
	下层	295	35.7	46	13.5
	计	553	22.7	102	15.6
次三子 B	上层	680	88.6	28	4.0
	中层	674	79.9	39	5.5
	下层	531	64.3	24	4.3
	计	1885	77.3	91	4.6

资料来源:根据野尻重雄著《农民离村之实证研究》第 490—502 页资料制成。

值得注意的是,战前日本农村新增劳动力这种恒定流出的转移结构,与受经济景气波动影响很强的传统的“潜在过剩人口”转移结构(即经济景气大量转移,经济萧条转移停滞或倒流)具有明显差别。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日本的社会结构和劳动市场所决定的。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来看,农户经营规模极小,

生产与生活合为一体,“家族制度”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长子为了维持“家”的存续,需要继承家业,因此必须留在农村。而农村耕地有限,次子、三子则必须离开。长子劳动力与“家”及以土地为中心的家产紧密相连,而次子、三子劳动力则完全不同。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无论经济景气与否,总有恒定数量的农家次子、三子被无情地从农村推出(push)。同时也决定了长子和次子、三子两种劳动力的供给性格的差距,亦即两者的供给曲线并非一致。从劳动力需求方面来看,资本家雇用次子、三子劳动力更为稳定、更为廉价。因此,对于价格低廉的次子、三子劳动力的需求逐渐恒定化,有时需求甚至超过供给。

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虽然以家庭成员的次子、三子离村非回归方式为主,但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兼业方式的转移。如外出打工的纺织女工在明治初期曾高达工人总数的 $2/3$ 之多。此外,去矿山、北洋渔场及其他土建工地临时打工的男劳动力也不在少数。特别是1933年进入战时经济以后,在城市近郊农村建立了许多工厂,出现了很多亦工亦农的“职工农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是以次子、三子劳动力的离村非回归方式稳定转移为主,以多种方式打工、兼业为补充的混合形式。

(三)转移者以年轻人、高学历者为主

关于转移者的年龄和教育程度(见表3)。据野尻重雄教授的实证研究,在1920—1930年期间男子转移者当中,15—19岁年龄段的比例最高,占34.3%。14岁以下者居第二位,占28.7%。20—24岁年龄段居第三位,占21.4%。25—29岁年龄段只占8.9%。30岁以后的壮年更趋减少,50岁以后的老年微乎其微。与男子转移者相比,女子的外出年龄更早一些。14岁以下者居第一位,占50.7%,超过转移者总数的半数。15—19岁年

表 3 1920—1930年期间日本农村人口转移者年龄与学历状况

		男 (%)	女 (%)
年 龄	14岁以下	28.7	50.7
	15—9岁	34.3	38.6
	20—24岁	21.4	8.6
	25—29岁	8.9	1.4
	30—34岁	3.4	0.1
	35—39岁	1.6	0.1
	40—44岁	0.8	0.1
	45—49岁	0.3	0.1
	50岁以上	0.6	0.2
学 历	文盲	0.4	0.3
	寻常科	29.7	66.6
	高等科	59.2	29.5
	中等学校	8.9	3.5
	专门学校以上	1.8	0.1

资料来源:根据野尻重雄著《农民离村的实证研究》(1942)中的表 67 83 84制成。

年龄段居第二位,占 38.6%。20—24岁年龄段开始大幅度减少,降至 8.7%。25岁以上者几近于零。转移者中女子与男子相比年幼者多,年长者少。牛山敬二先生利用战前的大量统计资料在新潟县的实证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⑩

从转移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高等科”(初中)以上的毕业生所占比例男子为 69.9%,女子为 33.1%,高于农村人口平均教育水平。特别是男子高等科毕业的比例比较高,这是其外出寻找稳定职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于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者的性别比例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在日本经济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从职工性别比例变化来看,男子首次超过女子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⑪。据此可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即明治初期至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以“打工型”的纺织女工为主体的女性外出者人数大于男性外出者,而 30 年

代以后开始出现逆转,进入战时经济后,男性外出者人数大大超过女性。

(四)转移的空间以城市为主

与欧美各国相同,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主要是流向城市。如前所述,战前从农村流出的劳动力,只是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其流动速度虽然无法与战后相比,但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主流并未发生变化。据《帝国人口动态统计》统计,1920—1930年期间,离开出生府县流动到其他府县的人口中的65%集中到城市。外府县出生的人口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神户等六大城市中占46%,在10万人口的城市中占28%,在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中占20%左右。此外,与战后相同,战前人口集中流动向东京一极的现象也相当明显。据《国势调查》统计,东京府的外地出生人口,1920年为173万人,1930年为264万人,1940年为343万人,分别占东京府人口的46.8%、48.9%、47.4%。东京府集中了全国15—39岁新增劳动力男子的1/4女子的1/3。由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推动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在1920年之前并不十分显著,据《国势调查》统计,1920年以后,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更为明显。

在1886年至1920年的34年期间,10万人以上大城市人口约增加490万,年平均增加14万。而1920年至1935年的15年间增加1000多万,年平均增加73万。1920年—1930年10年期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8%,其中人口为1—2万人的地方城市为14%,2—5万人的小城市为25%,5—10万人的中等城市为29%,而人口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则高达39%。“1920年以前大城市仅仅吸收新增人口的三成,而此后的15年竟吸收七成以上。”^⑩日本的总体城市化率在1886—1920年期

间从 10% 增加到 18% , 34 年仅增加了 8 个百分点; 而 1920—1938 年期间从 18% 增加到 38% , 18 年增加了 20 个百分点 (见表 1)。

(五) 转移的产业以杂业为主

战前日本农家次子、三子作为农业生产的剩余人口不断地流入城市, 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流向。那么, 每年从农村稳定地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究竟进入哪些产业呢? 外出农民就其自身愿望来说, 当然是优先选择垄断资本的近代大、中型企业, 但由于受教育程度、技术、技能等条件的制约, 加之招工数量的限制, 实际上进入这些“正式部门”极其困难。隅谷三喜男教授认为, 产业革命完成以后, 城市自身新增劳动力即可满足“正式部门”劳动力需求, 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心载体是“非正式部门”, 即小工业、零散家庭工业、小商小贩、饮食服务业、工匠的帮手、土木建筑及其他杂役、脚力和短工等“杂业层”。^⑥ 同时他还认为, 战前日本过剩人口的蓄水池与其说是农村, 倒不如说是“杂业层”。下面我们从战前日本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后获得的社会地位两方面对此加以探讨。

据中村隆英教授的推算, 1909 年日本就业总人口为 2542 万, 其中农林就业者 1603 万, 非农林就业者 939 万。在非农林就业者当中“近代雇用人口”只有 162 万, 而“传统非农林雇用人口”(与“杂业层”概念相近) 则高达 776 万人, 占非农林就业者的 83%。^⑦ 1920 年以后的各产业部门就业状况的变化如表 4 所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 (1920—1930 年) 的 10 年中, “工矿、建筑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停滞不动, 而“销售及其他”(大致相当于“杂业层”) 部门增加了 200 多万。也就是说, 每年产生的过剩人口的绝对部分进入这一领域。同期农业劳动力的比例由 54.4% 下降到 49.6% , 减少了 3 个百分点, 恰好

表4 战前日本各产业部门就业人口的变化状况

(单位:千人、%)

	1920年	1930年	1940年
农林水产业	14441(54.38)	14489(49.63)	14192(44.0)
工矿、建筑业	5576(18.55)	5993(19.49)	8418(26.0)
销售及其他	6948(27.07)	8858(30.68)	9619(30.0)
计	26966(100)	29340(100)	32230(100)

资料来源:根据井木正吉著《农家人口的战后十年》(《农业综合研究》9卷4号,1953年10月)整理制成。

与“销售及其他”部门增加部分(从27.1%增加到30.7%)相等。1930年至1940年期间是军事工业化时期,“工矿、建筑业”部门增加了240万。“销售及其他”部门虽然受到抑制,但仍有100万人的增加。上述事实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近代产业部门的雇用需求多寡,农业剩余劳动力照常流出;第二,农村劳动力只有小部分进入近代产业部门,而绝大部分被“杂业层”所吸收。

以上,从劳动力的产业分布角度论证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杂业层”的事实。此外,从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农村后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来看,也可同样证明上述事实。一般来说,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后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可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三种。上层包括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医师和小业主等;中层包括熟练工、工匠、火车司机、低级铁路员工、事务店员和护士等;下层(相当于“杂业层”)包括非熟练工、矿工、店员、男女佣人、短工和艺妓、娼妓等。野尻重雄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绝大多数人均从事杂业性的劳动。他们所获得的社会地位,男性的63.8%、女性的83.6%属于“下层”(见表5)。战前日本不仅城市存在庞大的杂业层,农村也存在“杂业层”。理所当然农村“杂业层”也吸引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①

战前日本除城市、农村的“杂业层”外,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

表 5 1920—1930年期间日本农村劳动力离村后获得的社会地位

(%)

性别	原来地位	转移后获得的地位			
		上层	中层	下层	合计
男	上层	23.7	25.2	51.2	100.0
	中层	13.2	21.5	65.3	100.0
	下层	8.3	17.4	74.3	100.0
	计	14.9	21.3	63.8	100.0
女	上层	7.2	20.1	72.7	100.0
	中层	1.7	13.8	84.5	100.0
	下层	0.5	12.1	87.4	100.0
	计	2.2	14.2	83.6	100.0

资料来源:根据野尻重雄著《农家离村的实证研究》第329页表制成。

也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出了很大贡献。1909—1935年期间,从业人员100人以下的小企业高达企业总数的96%,其中不足10人的家庭小工厂占半数以上。从吸收的职工人数来看,中小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80%以上。上述资料足以证实中小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民获得了自由迁移的权利。伴随着各项改革和“殖产兴业”的浪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随之起步。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非农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农户的次子、三子作为过剩人口每年以30—40万人的稳定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其转移路径可归纳为图1来表示。如图1所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初就是由农村进入城市。其中一部分进入中小企业,甚至城市的近代化大企业,而绝大多数则为“杂业层”所吸收。战前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虽然没有战后快,但其特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转移,既保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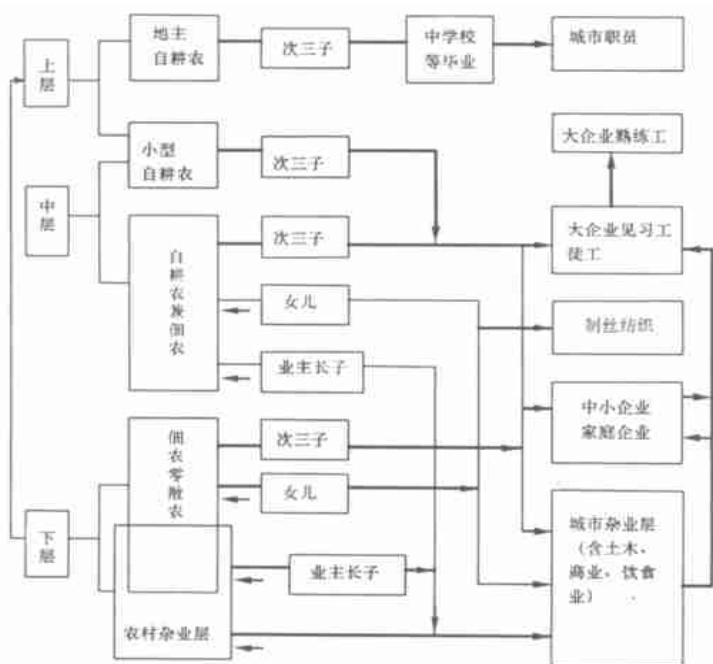


图 1 战前日本农村、城市间劳动力移动的主要路径示意图

注:①线的粗细,表示流动量的大小

②→表示流动的方向

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又维持了劳动市场的均衡,其转移过程是稳定的。

日本固有的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决定了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与欧美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又反作用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户次子、三子的稳定转移保障了战前日本经济机制的顺利运行。在农村由于次子、三子等剩余劳动力的自然流出既减轻了劳动力对土地的压力,又可通过家族成员的外出劳动获得一些

农外收入,使小农经营得以维持;在城市,由于农家次、三子的稳定供给及“杂业层”的大量存在,保障了资本家随时都可以最低价格雇用到劳动力。而企业的低工资又保障了资本家可获得高利润,从而也就保证了国家总体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笔者认为战前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颇值得借鉴。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前在人为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几乎没有展开。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各地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在农村内部就地解决了一亿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方式的局限性逐渐显露,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吸收能力明显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难以找到出路,每年有7000万人左右的农民以打工的形式涌入城市,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民工潮”。可以说,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解决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进入现代化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在这种形势下,鼓励发展以私营经济为中心的城乡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杂业),形成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从农村城市化和扩大现有城市就业机会两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是较为现实的办法。

(责任编辑:张义素)

①《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

②南亮進「日本經濟の轉換点」、創文社1970年、187頁。

③「農村過剩人口の存在形態」、《社会科学評論》第一卷第四号、1951年。

④伊藤達也「農村・都市人口学的バランス」、〔財〕アジア人口・開発協会編「日本の人口と開発」、1991年、119頁。

⑤ 古島敏雄「資本制生産の発展と地主制」、お茶の水書房、1963年、191頁。

⑥⑨⑭ 本多竜雄「日本人口問題の史的解析」、「人口研究」第6巻、1950年、10—12頁、57頁、30頁。

⑦ 満州開拓史刊行会「満州開拓史」、満州開拓史刊行会出版発行、1966年、464頁。

⑧ 東畑精一「農業人口の今日と明日」、「大内兵衛記念論集」上巻、1950年。

⑩ 并木正吉「農村人口の移動」野尻重雄編「農村の人口」、1959年、53—90頁。

⑪ 野尻重雄教授在其著名的「農民離村の実証的研究」(1942年)中指出,日本农民离村的主流是家庭个别成员的流出。举家离村的现象极为少见,每村每年只有1—2户。从其原因来看,来自外部的吸引(pull)的要因很少,几乎都是由由于破产、灾害等原因而被推出(push)村外。

⑫ 牛山敬二「農民層分解の構造——戦前期」、お茶の水書房、1975年、197頁。

⑬ 梶井功「農業人口論」、近藤康男編「農業理論研究入門」第三章、1957年。

⑮ 隅谷三喜男「日本資本主義と労働市場」、「日本の労働問題」(Ⅰ労働市場3)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195頁。

⑯ 传统非农林就业人口=非农林就业人口-近代就业人口(从业人员5人以上工厂工人+矿工+教师+铁路工人+电工+船员+市町村官吏)。见中村隆英「戦前期日本経済成長の分析」、岩波書店、1971年。

⑰ 牛山敬二「農民層分解の構造——戦前期」、お茶の水書房、1975年、9頁。